

宣侠父传

金 戈 鲍小牛

刘彤璧 奥存才

—

宣侠父，又名尧火、侠夫，号剑魂，1899年12月5日（农历十一月初三）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紫岩乡（今店口镇）长澜村。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靠教书和务农为生，为人正直，学识渊博，都会吟诗填词，并写得一手好字，但家境却很清贫。

宣侠父幼时就读于本乡坑坞小学，后转到他父亲教书的学校，17岁时毕业于店口觉民小学。他读书很用功，各门功课成绩都好，尤其爱好语文，写的文章内容充实，文理通顺。他还能写一手漂亮的空心字，每字一笔勾成，笔划不重复，观者无不叫好。侠父在父亲和哥哥任教的小学读三年级时，由于哥哥多病，常常不能到校上课，他就代替哥哥讲课。他年纪小，个子矮，站在凳子上，讲得头头是道，赢得了学生的信任，被誉为“小先生”。侠父11岁时，常在自己的家门口，向夏夜乘凉的乡邻们讲《三国志》和《水浒》上的英雄故事，并模仿英雄豪杰的行为。长澜附近有个大地主，为富不仁，40余岁还没儿没女，就在村外大路边修了一个凉亭，想借此“行善积德”，早生贵子。这个地主闻知侠父人小才高，就请他给亭子取一个吉祥的名字。侠父略加思索，写了“可亭”两个字。“可”

字者，一丁一口也，寓意这家地主不可能生儿育女。不学无术的地主不解其意，还请侠父的哥哥将这两个字书成匾额，悬在亭子上。后来有人把这个“谜”给解开了，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搞得那个地主十分狼狈。

1916年夏，宣侠父考入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校本科渔涝科学习。在这期间，他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思想。1920年夏毕业考试时，他获得总成绩第一名，并被获准公费赴日本留学。

宣侠父到日本后，进入北海道帝国大学学习水产专业，研究生物学。他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对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刊物也很关心，经常找来阅读，从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不久，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这使他很快认识到：实业救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从此他就如饥似渴地攻读和研究有关马列主义的书刊。他在同朋友谈学习体会时，说他学习马列主义的书就“像暑天嚼冰一样”。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并同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年7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国内革命出现的新局面，对宣侠父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加之，水产学校得知他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停止了他的公费待遇。他便于1922年毅然回国，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

宣侠父回国以后，一方面在浙江一水产学校任教，一方面经常往返于台州和杭州之间，与俞秀松、宣中华、俞大同等进行革命活动。1923年，宣侠父在杭州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他根据党的指示，在台州、温岭等地，发展一批党员，建立了一些党的基层组织。

—
—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以后，在我党和苏联的帮助下5月间，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宣侠父受浙江党组织的委派，带领樊嵩华等十多名青年到广州，考入黄埔军官学校，成为第一期学员。在黄埔军校，宣侠父学习了“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社会进化史”和军事课等十几门课程，每门功课成绩都很好。这期间，他还担负学生会的工作，处处以身作则，在同学中威信很高。

有一次，宣侠父根据蒋介石对于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的态度及其所作所为，对同学罗金五说：“蒋介石是新军阀。”不料被罗告发。蒋把宣侠父叫去狠狠训斥了一顿。不久，宣侠父又和蒋介石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冲突。1924年7月6日黄埔军校成立国民党特别党部时，蒋介石被选为执、监委员。接着，他便以校长和特别党部执、监委员名义指定党小组长，并命令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汇报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宣侠父虽被指定为三中队区分部党小组长，但他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遂上书特别党部，要求根据国民党的组织法由各组选举小组长。蒋介石知道后，召宣侠父严加斥责，并令他三日内写出悔过书，听候议处。过三日，蒋复召宣侠父问：“悔过书写好否？”宣侠父答：“学生无过，故亦不悔。”蒋介石怒甚，说：“我不愿有违师抗命的学生。”宣侠父说：“真理不可屈。”蒋介石恼羞成怒，遂撤销了宣侠父的党小组长职务，并再次限期写悔过书，否则开除。宣侠父抱定了“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的态度，三日后便愤然离开了军校。回到杭州后，他对朋友说：“我和蒋介石闹翻了，我已脱离军校。”从此，侠父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

一息。

三

1924年9月，原属直系的冯玉祥部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政权。皖系段祺瑞在北京成立了临时执政府。冯玉祥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徐谦、顾孟余等人影响下，将部队改称国民军，逐步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图大业。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也派干部帮助冯玉祥，进一步对军队进行改造。

1925年春，宣侠父等9人，受在上海的党中央派遣，来到北京，经李大钊、徐谦等向冯玉祥推荐，以左派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到国民军中工作。当时住在张家口的冯玉祥，急切需要左派国民党人到部队宣传三民主义。宣侠父一到张家口，就被冯委派为宣传员，住进新村五号平房。他学习苏联红军政治宣传工作的经验，在军队中成立了俱乐部，作为政治工作的阵地，并将随身带去的200本《三民主义》和其他革命书籍，放入俱乐部的图书馆内，这些书很快被青年军官们借阅一空。他还不断从北京运来进步书刊和采购文娱、体育用品，以丰富俱乐部活动内容。

为了与军队内的传教牧师争夺思想阵地，宣侠父将新村内的教堂改为讲堂，用孙中山和冯玉祥的图像代替了耶稣像，给官佐们讲授政治课，进行启蒙教育。他利用在黄埔军校学到的革命理论，认真编写讲义深入浅出地讲授《三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华史》。宣侠父多才多艺，又平易近人，经常帮助那些行伍出身的军官识文认字，还教他们打篮球、下象棋和围棋。他善于作古诗，书法又好，有时军官们登门请他写条幅，他总是有求必应，热情接待。青年军官梁冠英、吉鸿昌等，常找宣侠父讨论天下大事，宣侠父趁此机会，

耐心向他们宣传民主革命的道理。这位年仅 26 岁的年轻宣传员的才华和品德，很快赢得了官佐们的依赖和爱戴，也受到了冯玉祥的器重。

1925 年 10 月，国民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被冯玉祥任命为甘肃代督办。宣侠父奉冯命，随二师西征，从包头经宁夏到达兰州。他们沿途向军民宣传三民主义，宣传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等主张，受到军民欢迎。宣侠父还和钱清泉一起，在二师内秘密发展共产党党员，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兵运工作。兰州督署内的大讲堂，成为他们给二师少尉以上官佐和督署理事以上官佐讲授《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华史》、《国民革命史》等课程，宣传革命真理的课堂。他们还经常到梁冠英部和驻扎在东校场的吉鸿昌部，对梁、吉及其部下进行革命教育，启发他们投入到国民革命的洪流中去。

四

宣侠父在甘肃期间，不但在军队内部作了大量工作，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到社会各方面的群众之中，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及各种群众团体、开展革命斗争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宣侠父和钱清泉初到兰州时，甘肃榆中人、共产党员张一吾（张谷）也被派回兰州。他们三人根据北方局关于建党工作的指示，于 1925 年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张一吾担任特支书记，宣、钱二人任特支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甘肃建立的最早组织。

特支成立以后，工作开展得特别活跃，富有成效。当时的兰州没有什么工业，只有一批挑水工人（因居民食用黄河水）和剃头工

人。宣侠父等深入到这些工人群众中做发动工作，成立了挑水工人工会和剃头工人工会；还帮助郊区的贫苦农民建立了农会，与土豪劣绅展开斗争；在兰州一中和女子师范等校建立了学生会；天足会、少年同志会等群众组织也先后成立起来了。特支还出版《革命青年》和《妇女之声》等刊物 宣传革命思想 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

宣侠父和钱清泉的住地是督署后花园的塔影榭，军队内部的青年军官和兰州的青年学生，经常到这里来聚首谈心。宣侠父和钱清泉热情接待来访者 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并把《向导》、《新青年》、《独秀文丛》、《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进化简史》、《唯物史观浅说》等书刊推荐给他们看。宣侠父还经常深入到兰州一中、女子师范、皖江会馆、浙江会馆，以及地处道升巷口的中外大药房、玉泉山下的王家花园、国民党省党部所在地中街子 17 号等地方开展活动。通过教育培养，在这些地方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如兰州一中教员王陶、丘纪明 学生阎可选、王文骅、王文昭 女师教员韩玉珍、王青婉、谈巾瑜；以及出身贫苦的中外大药房女老板秦仪贞、藏族同胞罗占彪（桑姆丹）等，就是这个时候发展入党的。

甘肃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民族团结工作极为重要。宣侠父认真执行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关于民族工作的政策和策略，平等对待回、藏等少数民族，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向他们宣传反帝爱国、自强团结、民族平等的思想。他是我党最早深入甘南藏民聚居地区传播革命火种的优秀干部。

在这之前 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回族）派兵进犯甘南藏民聚居地拉卜楞地区，征粮派款，抢夺牛羊，焚烧寺院，无恶不作，藏民恨之入骨。国民军到兰州之后，拉卜楞寺活佛嘉木样的哥哥黄正清 率领了一个 12 人代表团，向甘肃代督办、国民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告状，求他主持正义，保护藏民的安定生活。但刘郁芬为巩固

自己的统治，不敢得罪拥有武装力量的马家势力，把此事长期搁置。宣侠父十分同情藏民的苦难，重视黄正清的请求。他一方面做刘郁芬的工作，劝其切实实行三民主义，扶助藏民，赶走马麒，另一方面将工作重点放在启发藏民的觉悟上。他首先帮助黄正清在兰州建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并亲手为该会起草了成立宣言。他告诉黄正清，文化促进会是一种组织形式，有了组织就可以和兰州其他群众组织来往，就可以参加各界社会活动，扩大政治影响。他还经常对藏民代表团讲：要创造条件学文化、学政治、学军事，提高觉悟。一个民族只有自强不息，内部团结，才能推翻邪恶势力的压迫，实现自由、平等。宣侠父每周给他们讲两次政治课，还教他们学习汉语、汉文，教唱《打倒列强》等歌曲；同时，也向他们学习藏话，彼此建立了亲密的友谊。黄正清很感激宣侠父的帮助，给他取了个藏族名字，叫札喜才仁，意思是吉祥长寿。

1926年夏，宣侠父作为甘肃督办的代表，在桑姆丹（罗占彪）陪同下，骑马来到甘南欧拉部落（今甘肃省玛曲县），首先会见了嘉木样活佛之父——拉卜楞各部落总办黄位中，反复向他讲述了民族自强的道理，建议他首先团结附近各部落藏民，建立组织，提高文化，充实武装。接着，宣侠父又会见了13岁的嘉木样活佛，还访问了附近部落的藏胞。

黄位中接受宣侠父的建议，决定成立甘青藏民大同盟，并派人分头去召集方圆400里以内的部落酋长。七八天后，酋长们纷纷应召而来，共有230余人。宣侠父代他们起草了《甘青藏民大同盟成立宣言》。在一个半阴半晴的日子里，酋长们身穿皮靴，围坐于鲜花盛开的绿草地上，召开会盟大会。黄位中宣布大会开始后，就请宣侠父讲话。

“我叫宣侠父，藏族名字叫札喜才让。”会场上立即响起欢呼声。宣侠父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酋长们讲述了“团结起来，自求

生存”的道理。他弯腰从草地上拔起一把青草，拧成草绳，一边用双手拉拽，一边说道：“将草拧成紧紧的绳子无论如何用力，也难以拽断。但是，将绳草解散，成为一根根草，一拽就断了……。”他接着说：“我们藏族同胞要团结，各个部落要联合，拧成一股绳，就力大无穷，纵有十个马麒，也不敢再欺侮你们了。今天请各位酋长来，就是要建立一个同盟，团结起来，自求生存。”侠父诚恳的话语，打动了酋长们的心，酋长们争先恐后站起来讲话，表示要团结起来，赶走马麒。最后，盟主黄位中宣读誓词，并约定于 10 月在西昌庄正式结盟。

会后，宣侠父准备回兰州，答应下月再来。临行时，各酋长送给宣侠父许多珍贵皮毛和银两、马匹。宣侠父再三婉辞不受，而酋长们坚持本民族习俗，不肯收回礼物；直到宣侠父宣布将这些东西带回去转赠给兰州少年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周刊做经费时，酋长们才欢欣而散。

宣侠父回到兰州后，继续支持藏民的斗争。冯玉祥五原誓师后，督署和二师要在东操场召开换旗大会，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宣侠父找黄正清商量，要他利用这个机会，将藏民的苦难情况传播出去，取得全国各地的同情和支持，也可对态度暧昧的刘郁芬施加压力，促使其下决心解决甘南问题。换旗会前，宣侠父就知道国民党省党部要印发宣言，并邮寄全国。他便代藏民起草了一份《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历数马麒的种种罪行。《泣诉国人书》印好后，同省党部的宣言一起邮往各地，并在大街小巷张贴。开会那天，主席台上坐着省级党政要员，还有马麒驻兰州一个旅的代表。宣传员将省党部的宣言和《泣诉国人书》一起散发，并给主席台上的官员们人手一份。马麒的代表看后面如土色，以为省党部是藏民的后台，便心虚起来，不敢作声。而刘郁芬却唯恐惹恼马麒，会后对宣侠父进行斥责。宣侠父据理争辩，为藏胞伸张正义。后来，宣侠父

随国民军联军援陕到达西安时，还为此事去见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请他督促马麒撤军。黄正清等也继续在钱清泉领导下进行斗争。在上下夹攻下，马麒被迫于 1927 年 4 月下令将军队撤出甘南。接着，甘南便成立了拉卜楞设置局；6 月，嘉木祥活佛回归拉卜楞寺。黄正清将藏民文化促进会也迁回甘南，还设立了 3 所学校进行文化教育，培养人才。解放后甘南的许多藏民干部，都是从这三所学校培养出来的。甘南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敬佩的朋友札喜才仁——宣侠父的革命功绩，他的照片和手迹一直被黄正清秘密保存到全国解放。

1926 年 2、3 月间，宣侠父被任命为三路军（孙良诚部）总部政治处长。1926 年 9 月 17 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将西北国民军改称为国民军联军，把五色旗换为青天白日旗，冯玉祥任总司令，共产党员刘伯坚任总政治部副部长。紧接着甘肃督署和国民军二师也在兰州东校场召开换旗大会，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宣侠父参加了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

五原誓师后，冯部重整旗鼓，转战宁夏、甘肃平凉等地，后挥师东南，援救被北洋军阀刘镇华部围困于西安达 8 个月之久的国民军联军第二军。在此期间，宣侠父日以继夜地工作。为了集中精力把军队改造成真正的革命军队，他辞谢了一般人求之不得的潼关县县长一职，经常往来于西安、华阴、潼关一线，指导政治工作，检查军队纪律，并果断地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

为了解决政治工作人员的严重不足，宣侠父从西安、华县、潼关等地，选拔了一批思想进步的中学生，举办政治训练班，并亲自给学员讲课。被他的学生珍藏至今的小册子《国民军史概论》，就是他当年编写的讲稿。在这本讲稿中，宣侠父科学地总结了国民军的成败和经验教训，指出：“一切军事行动只是政治的手段。国

民军正是因为没有一种政治上明确的主张，对于各项政治问题都存徘徊观望的态度，遂至引起军事上的失利。”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生长在尚未摆脱半封建制度的社会中，传统的复古和守旧的思想遂也变成国民军的思想。”在结论部分，宣侠父指出：“革命军将士必须明了革命是时代的使命，而不是领袖的命令。目前的任务，是要如何去明了世界的潮流，如何去明了中国的现状，如何去明白三民主义的真谛。……在这里我们可以预料，历史一定要记载着：‘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国民军已由国民革命努力到世界革命’。”这本讲稿对于启发学员的政治觉悟，明确政治工作的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宣侠父根据国民军联军内部右派欲夺取党权军权的动向，既注意搞好上层统战工作，更重视我党的组织建设。他积极在部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令其隐蔽活动。后来冯玉祥与蒋介石、汪精卫妥协，驱逐了公开的共产党员后，这支军队中仍然保存了我党的一部分力量。据方仲如回忆，1928年他同刘伯坚回顾这段党的工作时，刘很坦率地说：“那时过分相信这支军队中的领袖人物，这是右倾观点，应该像侠父那样，尽力发展我们党的组织。”

1927年4月初，刘伯坚代表我党提出“出兵潼关，会师中原”的战略方针，冯玉祥准备采纳之际，传来“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的消息，冯又犹豫不决。4月16日，在我党发动之下，西安各界6万民众召开“拥护革命军肃清后方，会师中原”的大会。会后，游行队伍向国民军联军总部请愿，刘伯坚代表总部接见各界代表，接受和支持民众的愿望。在这种形势下冯玉祥方下决心，于5月初决定将国民军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并在西安召开东征誓师大会，率师出征。此时，宣侠父被任命为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领中将军衔。在行军作战途中，他带领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基层，亲赴前沿阵地，做

了大量的工作。如在浉池，他及时制止了一支骑兵部队向商会摊派公款的行为，并处决了民愤极大的县兵差局长和大土豪王均。此一举动，深得民众拥护。

5月底部队到郑州，与武汉出发的北伐军会师。6月上旬，汪精卫来郑州时，宣侠父曾请汪精卫向将士们讲演党权问题。汪答应讲演，但对党权问题却避而不谈，宣侠父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所谓革命领袖在向右转了。为此，他悲愤地写下这样的诗篇：

右派诸人亦可怜，反俄反共自嚣然；
如斯也作胜利想，历史倒翻一万年。

这时，一场叛卖交易正在暗中进行。冯玉祥于6月10日与汪精卫举行郑州会议，又于6月19日与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被蒋介石拉了过去，把在大革命中经过浴血奋战，立下功劳的西北军引入了歧途。接着便在军队中开始“清党”，但由于我党对冯的影响较深，冯对于他周围的共产党人素怀敬慕之情，因此没有采取同蒋介石相同的屠杀方式，而是采用“礼送”和驱逐出境的方式。他把100多名军以上政工干部集中在开封一所学校中进行“审查”。宣侠父立即把已被集中的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党的支部。他被选为支部书记，在党员中做了许多思想工作，组织大家学习马列主义，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斗争。

7月14日深夜，宣侠父、蒋庭松、刘志丹、王汝楫、方仲如、孔广耀、曾晓渊、刘贯一等几十名共产党员，被一排士兵押上了两节闷罐子车拉往郑州，又被挂在平汉路列车上。至驻马店，大家才看到武汉分共的消息报道，有的人大骂，有的人沉默，闷罐车里更气闷了。见此情景，宣侠父便带领大家唱起了《少年先锋队之歌》和《国际歌》，使大家振奋了精神。车到武胜关，押车排长拉开车门，大声宣布了冯玉祥的驱逐令。车厢被搁置在铁轨上，无人问津了。经宣侠父和几个同志向车站方面交涉，两节车厢又被挂上了南去

的列车，在暮色苍茫中，驶向党中央的所在地武昌。

五

宣侠父等到武汉后，立即去找党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组织决定，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去参加南昌起义，一部分赴苏联学习，宣侠父和几个有条件回家乡开展工作的，被派回原籍，发动农民运动。行前，组织部长李维汉给他们开了组织介绍信。

1927年8月，宣侠父带了一箱书和一包简单的行李，回到诸暨家乡。他在长瀾家中住了几天，了解了本县农民生活状况和革命斗争情况，很快便到小西区金村找到党支部书记金树栋（金城），接上组织关系，参加了金村党支部的活动。

侠父少年时与金婉琳、金铃之兄同学，常到金村来，对金村农民十分熟悉。这次回来，得知村中金树栋、金树望等一批青年人都参加了大革命时的农民运动，组织了农民协会，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在白色恐怖中，这些人还加入了共产党，领导农民坚持斗争，心里十分高兴。当时全国正处于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时期，而诸暨的金村，却被称为“小莫斯科”，是全县有名的红色据点。而诸暨的反动势力也很强大，除了县长、县党部的官吏直接压制革命力量之外，还有几个反革命巢穴，如被称为“华尔街”的墨城湖，出了许多商人阔老，被称为“下关”的磨石山，出了蒋鼎文等一批国民党要员。宣侠父住在金村，指导全县党的地下工作。金村的年轻人常在夜晚聚集在他的住地，听他讲北伐中的故事，讲形势，讲革命道理。他还为村中的咸德小学写了一首校歌，歌词是：

长山蜿蜒 泄溪清 绿杨荫里 一片书声和歌声。

乘少年，学习参加大革命，这中间，翻天覆地自有人。

根据宣侠父的建议，诸暨党组织于 1927 年 9 月，在县城南一个叫滴水岩的石洞里，召开了全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的有宣侠父、陈兆龙、郭大善、金树栋、张以明、杨宗尧、汪益增、郭焕青、石康本等 20 多人。宣侠父用平静的语调向大家讲述了半年来的形势，指出革命的低潮是暂时的，终要取得胜利，但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当前的工作是要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同反动势力进行长期斗争，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要不失时机地组织群众，展开斗争，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还特别强调了发展壮大党的队伍问题，认为全县只有四五十名党员，数量太少，不能满足斗争需要，而且党员分布不平衡，枫桥和下北两个区力量太弱。因此，迅速扩大党的队伍，是一项基本任务。这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由宣侠父等 7 名委员组成的中共诸暨县委员会。在县委会上，大家又推举宣侠父任书记。但他表示他回来时间不长，对全县情况不熟悉，并说他不一定能在诸暨长期活动，建议由其他同志担任。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让他担任县委军事部长。

1927 年底，县委会议决定开展“二五减租”运动。那时的诸暨农村，正常年景下平原地区每亩稻田收 3 至 5 石（每石约 70 斤）稻谷。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租田耕种，种子和肥料全由己出，收入的稻谷要一半交租。每逢收获季节，地主派“分稻佬”来坐地收租，佃户还得设酒席招待，并赠送“分稻鸡”。交过租，再扣除稻种，便所剩无几了，农民负担极重。县委提出的“二五减租”，就是从原来的 50% 租额中减去 25%，将收获量中的大部分留给农民，并取消酒席招待和送“分稻鸡”；还提出要增加雇农的工资。党的主张通过减租会，在各村秘密宣传，深得农民拥护。但这时县委内部在怎样实现“二五减租”上出现了意见分歧。有人认为“二五减租”起先是由国民党提出来的，还应该由国民党来领导实现，如果那里的地主

不执行，我们就到县里打官司。宣侠父、金树栋等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主张充分发动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他们认为国民党对“二五减租”从来没有兑现，不能对他们存有幻想。减租是农民的迫切要求，党应该领导农民自己起来加以实现，这样才能获得农民的信任，让农民在斗争中认识团结起来的力量。争论结果，宣侠父等人的意见获得了多数人的拥护，遂形成决议：坚决执行“二五减租”，主要斗争对象是住在城里的大地主孙采臣等；由减租会带领农民向县政府请愿示威，提出减租要求，成立以党、团员为骨干的检查组，深入分稻现场进行监督，以保证减租决议彻底实现。

1928年庄稼长势良好。随着收获季节的到来，减租斗争也尖锐起来。地主们纷纷到县政府告状，要求派军警镇压减租运动。有的农民害怕地主势力，开始犹豫起来。县委立即召开减租会紧急会议，做出两项决定：（一）地主如果不按农民所提条件来收租，减租会就代替地主收租，做为减租会活动经费；（二）组织农民向县政府请愿示威。从此，减租会组织也公开了，农民的情绪又高涨起来。特别是陶朱乡的金村、木桥头、聚仙房、上下桑园、毛家、山下赵、团聚等村的几千农民，整队向县城出发。县长下令关闭城门，农民将县城包围。减租会代表将请愿条件写在祭鬼用的黄纸上，送到县政府。县长看了，知道是农民的诅咒和警告，非常害怕，就派警察局长游骞出面，拒绝农民要求，并在四面城墙上架起机枪威胁。减租会声言“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将县城包围了三天三夜。这时，各村已开始割稻，地主们怕减租会进行代收，自己得不到租子，便慌了手脚，赶忙派“分稻佬”按照减租会的规定去收租子。陶朱乡“二五减租”运动的胜利，带动了全县。诸暨县又带动了萧山、浦江、嵊县等附近6县，声势十分浩大。党领导的“二五减租”运动终于以农民的胜利而告终，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

减租斗争胜利后，敌人开始有计划地搜捕共产党人。宣侠父

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离开金村，回到了长瀾。

宣侠父在家乡艰苦的环境里，结识了金村少女金婉琳。两人在共同斗争中，建立了革命友谊。1928年底，宣侠父与金婉琳结婚。新婚第二天，就有人向姚公埠派出所告密，幸得农民石永莲及时通知，宣侠父才连夜翻越杭坞山逃走。党组织考虑到他在家乡目标太大，不宜久留，便决定他到外地开辟工作。

1929年春节将临的一天，宣侠父离别了新婚的妻子和父老乡亲，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六

为了争取大革命时期曾经与我党有过合作关系的前国民军旧部，1929年春节后，宣侠父来到山东济宁国民党军孙良诚部所属的梁冠英部。梁冠英在张家口新村驻团营干部训练班和国民军联军援陕、东征期间，同宣侠父曾经有过多次接触。他出身贫寒，受宣侠父的教育和影响较深，和宣侠父情谊甚笃。这次他热情欢迎宣侠父的到来，将宣侠父待为上宾。宣侠父很快和留在该部的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他们创办了一个名为《混战》的刊物，报道红军战斗和工人罢工的消息，揭露蒋介石新军阀的反共反革命的罪行。《混战》上有3篇文章公开署名“侠父”其中《狗咬狗 丢尽丑》和《吴精虫救主献策》两篇杂文是专门揭露和讽刺蒋介石等反动军阀的；另一篇是短论，题目是《怎样纪念五一》，号召工人们开展斗争，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还提出：团结起来“用工人阶级斗争的力量 消灭军阀战争。”

宣侠父的革命活动被冯玉祥知道了。两个月后，冯玉祥便电令梁冠英将宣侠父押至开封，关押在总部军法处，后又转押于潼关监狱。在狱中，宣侠父仍不忘读书，不忘向难友，特别是向青年难

友进行思想工作，还同大家一起锻炼身体，每天在室内练“八段锦”。

过了一段时间，冯玉祥为了与蒋介石打仗，将孙良诚部从山东调到河南灵宝。宣侠父被冯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分派到孙良诚部。孙又将他派往一支杂牌军队里去当代表。宣侠父明白，冯、孙之意在“送客”。因此临行之际他告诉朋友说：我这次去当代表不会再回来了。

1929年秋，宣侠父到达武汉，住在弟弟家中。因闻老父在他坐牢期间病故，便将妻子接来同住。后来，他又转到江苏镇江的三江营，住在妹夫家中。

1930年下半年，在蒋冯阎军阀混战中，梁冠英率部3万余众脱离冯玉祥，投靠蒋介石。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二十五路军，梁冠英任总指挥，驻军淮阴青江浦。1931年初，梁冠英得知宣侠父在镇江，便派人邀至军中，并任宣侠父为二十五路军总参议。宣侠父得以再次在梁部开展地下工作。

梁冠英虽投身于蒋，但对蒋仍时有提防。他一边暗中派人在津、沪等地与原西北军保持联系；一边又广召原西北军失业军官，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幕僚机构。这些人以梁为生，为梁图谋，梁视这人为亲信，经常委令他们直接或间接在蒋介石周围活动。宣侠父与这些人大都相识，有的还是黄埔同学，因而备受大家重视。他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和过去他在这支部队中的影响，很快建立健全了党的秘密组织。他还到上海，与左翼作家联盟建立联系，左联决定由阳翰笙同他联系。有一次，在上海见到阳翰笙，便托阳设法请上级党组织派人到二十五路军中工作。阳与在上海的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朱镜我研究，认为杜国庠当时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目标不大，容易隐蔽，就决定派他去。以后，上海党组织又陆续派去了20多位同志。宣侠父在二十五路军中办了俱乐部，下

设社会科学等五个分部。社会科学部里有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室，经常组织进步军官学习《社会科学小词典》、《社会科学讲话》等书籍，使许多军官受到革命影响。他还和同志们秘密宣传红军打胜仗的消息。鼓动官兵抵制“围剿”红军，反对军阀混战，不要为蒋介石卖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宣侠父和二十五路军地下党组织向官兵们做了许多有关抗日反蒋的宣传工作。部队群情激愤，要求回北方抗日的呼声甚高。宣侠父因势利导，鼓励官兵向上海的十九路军学习，起来抗击日寇侵略，挽救民族危亡。

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下，一方面派大兵“围剿”我革命根据地；一方面对国民党各杂牌部队加紧分化、瓦解和控制。为此，他任命宣侠父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议。这是一个只拿钱而无实权的闲职。

1931年底，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加入红军。二十六路军也是前西北军的旧部，许多军官都与宣侠父有过交往。因此，消息传来，宣侠父非常兴奋。正当他进一步加紧在二十五路军工作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那是1932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吕丹等几个秘密党员骨干正在开会，被梁冠英的军法处长发现，当即全部被捕关押。宣侠父得知，十分着急。他四处奔走，了解情况，终于探听到吕丹等被捕后表现很好，没有暴露党员身份，也没有泄露党的秘密。于是他便设法同他们取得了联系，鼓励他们一定要坚持斗争；并直接出面向梁冠英交涉，责怪梁不该因吕丹等议论抗日、对蒋不满，就加之于罪，要求释放这些爱国军官。由于军法处没有拿到吕丹等人的确实“罪证”，无法给他们判刑，加上宣侠父的周旋，梁冠英只好下令把他们“驱逐出境”。吕丹等经宣侠父的精心安排，虽安全撤离了清江浦，但二十五路军内党的组织却因这次事件而遭到严重破坏